

我在浩劫中的生死岁月

■ 华山橙

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姚文元那篇“评现代京剧‘海瑞罢官’”，以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大鸣大放，学校学生革老师的命，干部子弟整“七类分子”，道一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孩子，自然就挨整了。过不久，刘少奇倒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开始时“响当当”的口号不对了，那第一批“红卫兵”，成了“反动血统论”被批判了，我儿子道一成了红卫兵，加入学校的“井冈山兵团”。“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道一成为被肯定的一份子。不久，青海地质队来招工，道一报名被批准，要去这高海拔地区野外工作了。他黄疸病刚好不到一年，马上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我们实在不放心。但在这运动期间，我已处于随时可能挨整阶段，怎么能阻止他的“革命行动”呢，只好赶快为他准备好行装。他1968年1月5日离开北京奔赴青海。他们北大附中一共批准七个人去，三个高中生，四个初中生，都是只差几天就要毕业考试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道一当时离满17岁还差两个多月。

文化大革命最初阶段，一切工作都停顿了，大家先是去北大看大字报，后来科学院也到处有大字报了。有个星期天，马家驹来我家吃西瓜，他说他被贴了满墙的大字报，他认为全是捕风捉影、不符合实

际的胡说，非常气愤。我劝他要沉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想到，第二天我去上班，我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驹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我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但周围情况全变了，我完全孤立了。所有像我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都一样被整，只好听天由命。

特 嫌

1968年4月15日，向我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要我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的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我办公室，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我被隔离当天，他们去我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下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我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果然，文章还在后头。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押着我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我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我抬起头来看，问我认不认得。我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我的问题，从各个地

方来的，要我老实向大家交待我的罪行。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我写的讲了一遍。然后我的专案组组长问我，看见过手枪吗？我说看见过。他问我什么地方，我说“解放军”。他一个耳光，我鼻血被打出，滴在地上，他厉声责备我说：“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我：“擦掉”，我只好擦掉。

这位打我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我住院时还特地去看望我，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而且他后来一路顺风，爬上去，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调到北京市科技局革委会。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我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我一一作答，他问我还有谁，我想起一个，他再问我还有谁，我又想起一个，他再问，我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他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不说？”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我，我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我带东西？我说我记不得了，于是他问我，认识樊熹培吗？我说认识。他问樊有没有托我带东西给陈卫卿，我说我记不得，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我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式问：“是个小箱子吗？”我说：“我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我说我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我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我：“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我说不知道。我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熹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爆炸了他自己的厂？但再一想，如果樊和陈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这始终是个疑问。往后，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对我说，为了查清我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我说，我不过是个小伙计，陈比我重要得多，樊才是个头，只要我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我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所以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

跳楼

有一天，突然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是关在我楼上的人跳楼自杀。于是马上把我的窗户钉死，怕我也跳楼。再过几天，把大门口的收发室腾出来，将我关在

里面。又过了几天，那三楼跳楼自杀的人也关进我这屋里了。他是19岁的学徒工，身体很好，跳下来，跌在软泥地上，只掉了两颗牙，腿部皮肤擦伤，别处无伤。我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坐飞机”（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体罚方式，是将两臂往后抬起，像个喷气式飞机的样子，逼供的做法）实在受不了啦，斗他的人说下午五点，再不认罪，就对不起他了，他想反正活不了啦，不如自杀。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停了，小徒工们没事干，三三两两游荡荡荡。这天他同伴中有个人受了领导批评，心里有气，晚上走到一处大标语“毛主席万岁！”那里，他拿粉笔在上面打了几个叉。

第二天有人发现了，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查来查去，把他揪了出来。他不承认，猛斗他，他受不了啦，只好承认，但再想想，就推翻了，那就斗得更凶，这样反复几次，他就想自杀了。我跟他说，如果不是，千万不能承认，吃什么苦也得坚持，自杀了反而没法弄清楚了，还好像真的有罪了。过了两个礼拜，开大会，将他扭送公安局，我对他说那倒好了，因为公安局总有一定的标准，不像在我们单位，不懂法律，没有标准，群众乱来。

果然，两个礼拜后，他被公安局无罪释放回来。他进厕所来，正好只有我一个人在打扫厕所，他向我敬个礼，表示感谢。公安局也查出了那个打叉的小徒工，他承认错误，只是小孩子脾气，不能算反革命，教育教育就完了。那19岁的学徒工，当时跳下来如果死了，真是白死了。群众运动，来势汹汹，大家要显示自己积极，什么可笑的事也会发生。有一次我被押出去“提审”，有一个人讲：“他还神气活现戴着眼镜！”于是马上把我的眼镜拿走了。第二天我向看管我的人说，能不能把眼镜还给我，他也是戴眼镜的，很快就拿来给我了。可万没想到，这人第二天也被隔离审查了。是因为他同情我而被隔离审查，还是别的原因，我就知道了。

华善也被隔离

孙华善也被隔离审查，因为他们想从她那里套出我的问题，说我的特务活动她都知道，她回答说她知道我不是特务，没有任何特务活动，他们为了吓唬她，将她也隔离起来，但她仍一口咬定我不是特务，直到后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502所，有一天在她被关的房间里，审问她的人问不出东西来，想进行体罚，她大声叫起来，正好工宣队员经过，听到叫声，进去了解情况，认为将她隔离审查的理由太

不够了，立即将她释放回家，才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隔离审查。在这四个月内，我八岁的小儿子道亮一个人在家，大门不许锁，随时要来抄家，宿舍楼大门口马路上两尺见方的大字写着“打倒老牌特务朱维衡”的标语，小朋友当然要来欺侮他，他们常威胁他，如果不拿东西给他们吃，就要打他，他能找到的只有一些罐头食品，那还是几年前困难时期难得配给的一些水果罐头之类，我们舍不得吃留下的，等华善放回去时，全都没有了。

华善被隔离期间，看管的人从华善那儿拿饭票交给道亮，让他自己到我们食堂去吃饭。我在门缝里看到他老远从家里走来吃饭，心想还好，他还活着，觉得已够安慰了。我去食堂吃饭时，要在头颈上挂一块三尺乘二尺的黑板，上面写着“老牌特务朱维衡”，由看管人押着去食堂，只许吃最便宜的五分钱的菜，窝窝头，不许吃馒头或白饭。走在路上，偶尔碰到华善对面走来，也是被押着去吃饭，只好装作不看见，否则会被认为我们两人打暗号，不得了。大儿子道一从青海回家探亲，我已被隔离，一天，他们告诉我说我儿子回来探亲，我们父子相见，什么话都可以讲，安排我们在一个房间见面，可是隔壁房间有人在听我们谈话，两房间之间的门是开着的，所以我儿子见我，只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事求是”之类，我也

文化大革命时期漫画



只能回以套话，“我一定实事求是，老实交代”等。这一场戏犹如“样板戏”“红灯记”中“探监”一幕，实在可笑。

道一也被隔离

以后道一没有再回来探亲，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回青海不久，也被隔离审查了，因为在抄我家时抄到道一写回家的信中，有一次说：“报告爸妈一个喜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们钻探出某某宝贵金属”，这句话证明“小特务向老特务汇报地质情报”，他一个自认是“革命”的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罪名，就和他们辩论，他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经典理论，他们辩不过，只能动武。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罪名“现行反革命”，因为他给他姨母一信封右上的邮票，恰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芭蕾舞演员们踮着脚尖，举枪向右瞄准的姿势，而信封左上方印的是木刻画毛主席头像。于是有好事者指控说他要杀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他被整两年多，不断写材料申诉，并以罢工等形式不断抗争。直到后来，队党委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当场抓获而受处分调离，新换了一个党委书记，他是北京地质部派到青海地质局的干部，亲身体过挨整的滋味，懂得运动中乱整人的事实，他认为这小青年不可能是特务反革命，终于将他解放了。

道一当钻探工人的头一年（1989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夜班，钻机起钻守井口，正弯腰时，一个1公斤左右重的“蘑菇头”（提升钻具专用螺丝），突然脱扣，从十来米高处跌落下来，正打在他腰部，幸好那晚他身穿老羊皮衣裤内加绒衣裤，腰部很宽很厚，没伤到骨头。那个年代，讲究“轻伤不下火线”，他仅休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坚持上班，自此留下腰痛的毛病。五、六年后，腰痛加剧，脱离钻探行业，改跑基建材料的采购。再后来，队里调他去河北遵化学习三个月精密铸造，回去后当了班长，凭借学习期间的认真观察领会，白手起家，创建起了精密铸造车间。他还自费订了很多杂志，自学了机械制图，熔模精密铸造，金相学等相关知识。在地质队工作十年后调到湖南湘潭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研究院附属工厂电子计算机组当工人，后参加电视大学学习并顺利完成学业。赴美留学前，曾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补习英语。

牛鬼蛇神

我从两人一间换到四人一间的隔离室，四人的外号正好是“牛，鬼，蛇，神”。我是牛，因为我死不承认是特务；白是鬼，因为他写的检查末了签

字，看上去像他名字，实际上是个“冤”字；韩是蛇，因为他说他们朝鲜人喜欢吃蛇，给我们讲怎样抓蛇，怎么吃；王是神，因为他本来是红极一时的“青年科学家”，共产党员，第一研究室主任，他以前整过人，懂得那一套办法，为了追查他在交大读书时的业余电台是国民党安排的机关，把他隔离起来，但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总是说不过他，所以他很“神”。我们刚进这房间时，规定互相不许说话，但慢慢看管的人也不管了，我们从轻轻地，偷偷地讲，到大声讲，开玩笑，他们也不闻不问。在我五十岁生日那天，他们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为“座山雕”庆祝五十大寿那一段，为我祝寿。

有一天，突然把我们全体六、七个有“特嫌”罪名的人召集在一起，叫我们的陆所长给大家来讲，他是怎么在美国时参加特务组织，代号是什么，任务是什么。他回国后，1956年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时，遇到他MIT的老师，也就是他特务组织的领导，将技术情报交给他的情况。听得我们目瞪口呆！这位高级科学家竟真是个特务？但大家谁也不敢相信，认为他是胡编乱造，不过是想早点解除隔离。果然，在他讲完后，运动领导人赞扬他的行动，要大家学习他这“正确”的选择，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马上宣布解除他的隔离，回家自由活动，回到他自己的所长办公室上班。其实这时根本谁也不上班，他被“解放”了，反而无事可干，而且谁也不敢理他了。我们多数人认为他太没有骨气，这样乱编一套，不实事求是，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对我们这一批人却有坏处。大家都看不起他。运动后期，“抓516分子”了，我们502所最左的“勤务组”成员斯某，从五楼跳下自杀死了，好几个运动中整人最积极的知名人物，也都挨整了。1969年4月30日，我被解除隔离，绝大多数人先后都自由了，可是我们那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陆所长，却拖了好几年才真正解决问题。

劳动三年

我解除隔离只是可以回家，并不能回研究室去工作。每天上班是到锅炉房报到，推煤，出灰，爬地沟更换暖气管外包的石棉层，抬水泥地沟盖，这盖重200多斤，有一次我在前面，抬着走在跳板上，一不小心，人跌入地沟，那地沟盖架在地沟上面，没有伤着我，要不然，我就没命了。锅炉改为机械



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画

自动加煤，让我学了操作锅炉加煤，出灰，清理炉盘，检修；后来学电焊，气焊，车工，并要我设计一台水管自动套丝机，把它全部加工出来，用得很好，再造一台，减轻了很多体力劳动。往后要我学瓦工，学木工，盖平房，上房梁等等，倒是学了不少手艺。

回 室

直到1972年才让我回研究室，但在别人领导下工作。我可以进图书馆看书了，我收集了直线电机，低速电机，力矩电机，及磁浮列车等许多资料，加以整理，用中文写出，我和华善一起刻蜡纸，油印成几种小册子，给同专业的人参考。后来资料室拿去打印成比较更整齐的小册子，分发给其他图书馆，所以后来看到外单位文章中，好些注明引用了我那些小册子的内容。

阴 国

运动还没有结束，外地还有武斗，但已可以自由走了。有一天蔡明芝意外地从西安来访，他是最勤于与朋友联系的人，我问他几个最熟的朋友，他都知道情况，问到马家驹，我与他同在北京，却在他和我都挨整后，不敢联系了。他告诉我：“他去英国了”，我大为惊奇，怎么他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国呢？他说：“去阴国了”。啊呀！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他性子急，被贴大字报就受不了啦，但何至于自杀啊？明芝说他们两口子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同时挨整，他岳母有好几个金戒指藏在他们家，被抄家抄出来了，他们就被穷追猛打，受不了啦，躺在床上，电线缠身，合上电门自杀死了，两个小孩由小姨子带着，改姓王了。多惨啊！我最接近的老同学，就这样走了！

（编辑/月勤）